

戰爭起因分析

—以1939年德國進攻波蘭為例

著者／翟文中

海軍官校74年班【美國能源部桑蒂亞Sandia國家實驗訪問學者(2002年)】
歷任海軍總部情報署、國防部情報次長室、戰略規劃室與整合評估室服務
現為海軍備役上校

自有人類歷史以來，戰爭與人類文明的發展可說相伴相生，在漫長歷史進程中，僅有少數世代人們未曾接受過戰爭的洗禮。戰爭帶來了毀滅性破壞與大量的傷亡，人們在憎恨與咒詛戰爭之際，同時也開始研究戰爭何以會不斷地發生。更確切地說，對戰爭的起因進行深入探討，不僅有助人們理解戰爭的本質與特性，亦可對人們預防戰爭再起做出具體的貢獻。由於戰爭係人類社會的重要政治行為，在這種情況下，政治與國際關係學者對此議題開始了廣泛而深入的研究，同時出版了為數眾多對戰爭起因進行分析的學術論著。當中，為人耳熟能詳地作品包括了尤班克(Keith Eubank)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根源與起因》(World War II: Roots and Causes)¹以及道爾提(James E. Dougherty)與普法茨格拉夫(Robert L. Pfaltzgraff)合著的

《爭辯中的國際關係理論》(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omprehensive Survey)等書。²

在這些汗牛充棟的學術論著中，值提一提的是國際關係學者華茲(Kenneth N. Waltz)的傳世名作《人、國家與戰爭：一個理論性的分析》(Man, the State, and War: A Theoretical Analysis)。在這本書中作者運用個人因素、民族國家與國際體系三個層次對戰爭的起因進行了深入分析，這種不側重單一因素能兼顧全體的分析途徑，已被當前多數研究衝突、戰爭與國際事務的學者採用，成為探討國際關係各項重要議題時的基本分析工具。在本文中，作者將以問答方式，藉由此分析途徑對1939年德國何以發動波蘭戰役進行深入的探討。透過這種多面向的歸納分析途徑，可使讀者對引發德波戰爭的關鍵性因素能有更為清晰的認識。

壹、戰爭起因：個人因素分析

戰爭的發起係由人下達決策來執行的，因此決策者的個人特質及其影響事件結果的能力對是否發動戰爭具有關鍵性的主導作用。此外，決策者對於外在環境變化的敏感度及其在政策執行上的運作規範(operational code)，攸關其對國際事務如何回應以及決定採行何種政策選項。在下文中，我們將對這些涉及戰爭發起的個人層次因素進行扼要地說明。

問：希特勒(Adolf Hitler)發動波蘭戰役是出於人類的侵略本能、好戰性格還是統治慾？是理性的還是不理性的？

答：希特勒進攻波蘭與其個人的強烈統治慾有關。在《我的奮鬥》(Mein Kampf)一書中，他再三地強調「德意志優於一切」(Deutschland Uber Alles)，希特勒認為亞利安(Aryan)民族是優越至高無上的，他更大言不慚地指出：「優越種族為了自身的利益，去征服、剝削、掠奪乃至消滅劣等民族，乃是她無可推卸的職責與權利」。基於如此認知，加上其一貫主張向東拓展生存空間(Lebensraum)，故希特勒發動波蘭戰役並不令人感到意外。

希特勒進攻波蘭並非出於不理性或是

感情衝動。依其觀點，1939年9月發動戰爭對德國最為有利。就理論言，德國再武裝採取的政策應稱為「寬軍備」(Armament in width)而非「深軍備」(Armament in depth)。更確切地說，德國再武裝的著眼係如何在未來提供最大數量的人力和裝備，而非做長遠的打遠準備同德國敵對國家進行長期鬥爭。因此，德國必須運用速戰速決的戰略維持對敵方的相對優勢始能穩操勝算。就此而論，依當時的國際情況而言，希特勒的計算相當正確，這場戰爭是在理性下做出的決策。

問：發動戰爭是誰的決策？決策者影響事件結果的能力如何？決策者是否有其他行動選項？選擇進攻波蘭是希特勒的個人偏好還是一貫目標？

答：希特勒是發動這場戰爭的「唯一」決策者。

希特勒總攬黨、政、軍大權於一身，加上德國已沒有憲法及民選政府等因素，使其決策對事件產出具有絕對的影響力。

在希特勒決定進攻波蘭的過程中，沒有對其他任何可能的行動選項進行評估。1939年5月24日，他召集了三軍高級將領訓話，曾指出：「我們祇有一種

決定，那就是祇要有適當時機就攻擊波蘭，像捷克那種情形是可一不可再」。對希特勒而言，他最希望的是在一次局部戰爭中自由處分波蘭，戰爭已成定案別無其他選項。

進攻波蘭並非希特勒的偏好，而是他一貫的政策目標。希特勒的目標係在歐洲大陸向東擴張，為完成此目標，其步驟依序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解決東南歐問題（征服奧地利與捷克斯洛伐克）；第二、進攻波蘭；第三、和蘇聯共產主義對決。1938年4月，德國兼併奧地利；1939年3月佔領捷克斯洛伐克。希特勒完成了第一階段目標後，進攻波蘭實為其完成第二階段目標必須採取的行動。

問：希特勒對環境的敏感度為何？他對於外交事務的經驗及熟稔度如何？他的決策模式為何？他的運作規範又是什麼？

答：希特勒對當時的國際環境具有非常清晰的認識，並能對環境的改變做出適切的反應。他對於英、法兩國的綏靖心態也能善加利用，使整體環境對他十分有利。因此，他始終居於優勢而能為所欲為。他認為德國進攻波蘭，英、法兩國即使會為保全顏面而戰，但波蘭一旦被征服，他們也就會承認而批准這項行

動。事實上，當德軍於1939年9月1日進攻波蘭後，英法兩國遲遲沒有宣戰（9月3日英法兩國始向德國宣戰），而其對波蘭的援助更是緩不濟急。這種發展足以證明希特勒對環境的確有異於常人的敏感度。

希特勒出任總理前沒有任何從政經驗，他連國會議員都沒當過，更不用說擔任過政府閣員等重要職務。除德、奧兩國外，他對於其他國家的瞭解亦不深入。因此，希特勒可說是全無外交事務經驗，但他對於世局的發展卻有敏銳的判斷，故在外交事務上能掌握方向並發揮主動。1936年，德國片面撕毀凡爾賽和約（Versailles Treaty），德軍開入萊茵非武裝區；1938年兼併奧國以及1939年佔領捷克斯洛伐克。這些事例均是希特勒在外交上以極小代價獲得最大成果的例子。就此觀之，可知希特勒對外交事務具有慧眼靈覺。

希特勒的一貫政策目標，就是要為德人爭取「生存空間」。然而，在《我的奮鬥》中，他坦承：「在十九世紀想要用和平的方法獲得殖民地已屬不可能。所以今日要實現這種殖民政策，祇有出於奮鬥一途，為了完成這項目標，德國應該隨時準備流血」。此外，他更一再地宣稱：「我們的祖先，對於國土的獲得，不是得之於上天賞賜，實是從

奮鬥中得來的。所以將來能夠給我們民族以土地生命的，也祇有武力而已」。由此可知希特勒的決策模式，即是以武力為後盾來追求領土的擴張。

希特勒在政策上的運作規範（operational code），首先係與意欲染指的國家以訂立條約、協定等方式，使對方相信德國是愛好和平、不具侵略性的，從而鬆懈了防範德國侵略的野心。當雙方和平共處了一段時日後，再製造事端，要求對方就爭議議題進行磋商。最後在會議桌上，以武力為後盾，迫使對方順從其意志或要求；若對方拒絕，則以武力進行脅迫。希特勒兼併奧國、佔領捷克斯洛伐克以及進攻波蘭，均依上述提及的運作規範進行。

藉由上述說明，我們可將戰爭起因與個人因素做以下連結：希特勒進攻波蘭並非出于感情衝動或是不理性，他採取的每一步驟都是經過理智與縝密的計算。他深信以武力開拓「生存空間」是合法的，其強烈的統治慾加上其在外交上的節節勝利，使其深信英法兩國會在不完全干涉情況下同意其處分波蘭。於是他在1939年9月出兵波蘭，執行其擴張政策的第二階段目標。事實上，當德國進攻波蘭時，希特勒的親信中，只有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與李賓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兩人是主戰

的，其他高階文官皆屬主和派，尤其德國陸軍高階將領幾乎全數反對希特勒發動戰爭，德國參謀本部更認為德國軍事力量尚不充足，實在不適合進行軍事冒險。由此可知，波蘭戰役的發起與決策者的個人特質及決策模式有關。在這個例子中，吾人不難發現，人類行為在戰爭發起中佔有重要地位。

貳、戰爭起因：國家因素分析

國家係國際關係的最主要行動者，由於各國具有主權可以獨立行事，因此其採取行動間的互動關係，將會產生「衝突或合作」以及「戰爭或和平」等各種不同結果。因此，當我們對戰爭起因的國家因素進行分析時，將會置焦點於國家政治體制特性的探討。例如：決策模式、政府型態、政治文化以及人民對決策者政策的支持程度等等。這些因素多屬國家內部政治範疇，卻是影響國家外在行為的主要力量，戰爭的起因很多係植基於此層次的各項因素之中。

問：納粹的極權決策模式是否較易引發戰爭？德國人民對希特勒政策的支持度如何？他們能否影響當局決定發起戰爭的決策？

答：納粹政權為一獨裁政體，其決策過程是無須民意監督而可為所欲為。希特勒是

一個達爾文主義者 (Darwinian)、一個極端民族主義份子，他動輒以國家利益與民族生存為由，不顧國內外反對而挑起戰爭。因此，吾人可以認為，納粹的極權決策模式雖不是引發戰爭的主因，卻為獨裁者希特勒決定發動戰爭提供了一條途徑。

1936年3月，希特勒撕毀凡爾賽和約，德軍開入萊茵非武裝區。隨後希特勒解散國會並公開宣布請德國人民用投票來表示對其政策的支持。結果在3月29日的國會改選中，投票率達99%，而國社黨的獲票率高達98.8%。同樣狀況發生在德奧合併舉行的公民投票中，99.08%的選民贊成希特勒的行動。上述數字固然攬有人為因素不可盡信，但德國人民絕大多數贊成希特勒的行動是不容置疑的，由此可知納粹政權還是普獲德國民眾支持。

德國在二次世界大戰前，雖是一高度文明國家。但由於希特勒取得政權後實施獨裁專制，人民無法透過代議政治表達意見，故廣大民眾對於執政當局任何行動，根本毫無影響力的。在這種情況下，祇要決策者一意孤行甚至選擇戰爭，縱使德國人民普遍反對亦無法產生任何反對或制衡的力量。

問：德國政體由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君主立憲轉變成戰後的共和制度，對戰爭的發生有無直接關係？希特勒需要用戰爭做為解決國內政經問題的手段嗎？德國文化是否將國家性格塑造成具侵略性的，而使德國在不知不覺中成為戰爭機器？

答：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德國被迫採取西方人所贊成的共和制度。這種制度在理論上具有相當優點，但並不能維繫德國人民的忠心和激發他們的意志。德國人是慣於服從權威的，當他們沒有效忠對象時，他們在心理上會出現惶惶不可一世之感。戰後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由年高德劭的興登堡 (Paul von Hindenburg) 暫時填補了這種心理上的真空，但這不能完全滿足日耳曼民族的需要。在這種情況下，希特勒遂應運而起，納粹政權與第三帝國的出現也就水到渠成，伴隨而至的係其後一連串的對外戰爭。然而經過深入剖析，可知國家結構的轉變與戰爭並無直接關係，戰爭祇是單純地反應出決策者的不同行動選項而已。

1934年，當德國人民被要求用公民投票方式來批准希特勒接替興登堡出任元首 (Fuehrer) 兼國務總理 (Reich Chancellor) 時，投贊成票者佔全部票

數的89.93%，可見德國國內贊成者佔多數，這個事實在在地顯示希特勒毋須藉對外戰爭來凝聚國內的向心力。同樣地，在1933年到1936年間，希特勒的經濟政策已使德國失業人數由600萬減為100萬，復興和繁榮的程度令人感到不可思議。希特勒透過對外戰爭來移轉國內政經問題的假說毫無根據，事實上也沒有這個必要。

黑格爾 (George Wilhelm Friedrich Hegel)、尼采 (Friedrich Nietzsche) 與史賓格勒 (Oswald Spengler) 的哲學思想對德國文化影響深遠。他們雖然對戰爭的看法不盡相同，但都一致肯定戰爭的正當性與必要性。黑格爾認為戰爭有助於加強國家團結，他更認為假使沒有戰爭，國家就會變成一塘毫無生氣的死水。尼采認為戰爭是用來重建人類文明不可或缺的一環，他的超人哲學對德國軍國主義興起具有深遠影響。史賓格勒一方面對尼采的超人哲學深信不疑，另一方面更對支配次等民族的必要性大力倡導。在德國如此的文化背景下，一般人咸信德國成為戰爭機器實是無可避免的結局。然而，當希特勒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及波蘭時，德國民眾表現的卻是沉默而毫無歡

欣神情，這證明了德國人民並非如一般人想像地好戰，戰爭更不是日耳曼民族生存發展的唯一手段。

在德國進攻波蘭的案例中，吾人發現國家結構的變遷和戰爭發起間並無直接而必然的連繫，和戰爭有直接關係的係政權型態及決策模式。即令如此，後面兩項因素並非德國進攻波蘭的真正起因，它們僅提供了決策者通往戰爭的一條捷徑。把戰爭視為解決國內政經問題的手段，亦常取決於決策者的個人認知與是否將其做為政策行動選項。就此觀之，國家結構僅對戰爭的發起提供了催化作用，真正決定走向戰爭的仍是決策者的個人行為與運作規範。

參、戰爭起因：國際環境分析

國際環境會對國家施加某種力量使其做出被動反應，相關因素計有國際條約與權力平衡等各項變數。例如：前者對國家在國際社會上的各項活動構成某種程度制約，防止國家輕易地選擇以戰爭做為解決爭端手段；權力平衡政策或是概念，則係當某個國家意欲追求成為霸權時，其他國家將會聯合起來對其進行必要反制。這些因素加上國際政治氛圍，均會對國家走向戰爭形成某種程度的誘

導或是遏阻，在本部份將對這些因素進行扼要說明。

問：英、法兩國的綏靖政策（Appeasement）對希特勒的發動戰爭應負多少責任？國際間的權力平衡關係是否不利德國，使得希特勒必須藉戰爭來調整德國在權力平衡中的位置？

答：尤班克（Keith Eubank）認為英、法兩國的綏靖政策不需要對希特勒的發動戰爭負起任何責任，因為它是1920年代及30年代列強普遍尊重的原則－認為戰爭是可以避免的。事實上，透過相互的談判、和解是可以解決德國對凡爾賽條約的不滿情緒，使歐洲的緊張情勢得到抒解。當捷克斯洛伐克發生蘇台德區（Sudetenland）日耳曼人問題時，雖經英國首相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與法國總理達拉弟（Edouard Daladier）召開慕尼黑會議（Mussolini Conference）進行斡旋，但仍無法駕馭希特勒的野心，德國最後還是選擇走向戰爭。因此，英法兩國的綏靖政策雖非引發德波戰爭的起因，但它卻提供了野心家希特勒的極大誘惑與機會，從而增加了戰爭發生的機率。

就權力平衡觀點言，慕尼黑會議後優勢已逐漸傾向對德國有利。因為一方面

不僅解除了捷克斯洛伐克40個裝備優良的師，而且同時使德國釋出了原本用來對抗他們的眾多兵力。這樣的變化顯然對英法兩國不利，在德國佔領捷克斯洛伐克後，這種情勢變得更加明顯。因此，希特勒沒有任何理由須藉調整權力平衡而發動戰爭，祇能說由於國際體系的權力平衡出現有利德國趨勢，為其發動戰爭提供大好機會。

透過上述說明不難發現，國際間的權力移轉（power transition）不見得會引發戰爭，尤其權力平衡的認定並無客觀的標準。國家權力涉及諸多抽象概念與非計量因素，例如國民意志、精神戰力與國家認同等等，這些變數對國家權力的形成具有決定性影響，卻無法量化納入權力平衡進行相對比較。基於這項前提，權力平衡失衡與國際環境的無政府狀態（anarchy）祇能為戰爭發生提供一個誘因。至於這個誘因是否引發戰爭，完全取決於決策者的個人認知與行為動機。

肆、結論

在本文中，我們運用華茲提出的三個層次理論性分析架構，對1939年德國進攻波蘭戰

役的成因進行了個人、國家與國際環境等三個面向分析。藉此除可迴避分析時採用單一變數過於簡約的弊病，亦有助我們對這場戰爭的起因有更為清晰與宏觀的瞭解。在德國進攻波蘭的例子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引發這場戰爭的關鍵性因素實為決策者的個人特質。政府型態、國內結構與民意支持固然對決策者提供了必要奧援，國際環境的權力失衡亦提供了希特勒發動這場戰爭的外在性誘因。倘若決策者的目標係在維持現狀或追求和平，即令國內民意與國際環境提供了再多誘因，仍不致於使一個國家選擇將戰爭做為行動的唯一選項。相反地，倘若決策者好戰成性，他仍會不顧國內外客觀因素，而一味地選擇走向戰爭之途。在這種情況下，戰爭的發生似乎就成為不可抗拒趨勢，1939年德國進攻波蘭就是說明此種情境的最佳例證。

1 Keith Eubank ed., *World War II: Roots and Causes* (Lexington, Massachusetts: D. C. Heath and Company, 1975). 作者認為國家走向戰爭的原因包括了取得領土；強化安全；獲得財富以及威望；維護種族、文化與宗教的認同；維護或擴張王朝的利益；削弱外來敵人；取得或保有殖民地帝國；擴張政治意識型態；防止國家分離、崩解或是領土損失；介入海外危機衝突（來自榮耀、條約義務、支持對我友善政府、推翻對我不友善的政府或是協助解放鬥爭各種不同理由）；維持聯盟的可信度；維持或是恢復權力平衡，防止其他強國成為霸權；保護海外重大經濟利益；支持公海航行自由原則；填補權力真空；藉由發起小型戰爭用以替代未來可能出現大型戰爭，或是發起預防戰爭（藉贏得一個與崛起中強國的戰爭勝利，防止這個國家未來成為本身安全威脅）；對過去傷害本國的他國政府進行報復；保護瀕於危境國家以及保護國家榮耀或對嚴重羞辱從事復仇。

2 James E. Dougherty, and Robert L. Pfaltzgraff, Jr., *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omprehensive Survey*, 3rd ed.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Inc., 1990). 作者認為戰爭起因計有：民族主義對抗（因為種族、語言、宗教、意識型態加上敵對與衝突的歷史回憶得到進一步地強化）；資本帝國主義；擁有或是缺少聯盟；軍事技術創新做為動力以及軍工複合體追求利益導致的軍備競賽；權力平衡政策；邊界衝突對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的安全構成了嚴重威脅；統治菁英的不安全感，為了鞏固本身態勢與強化內部整合，藉由外交目標移轉內部不滿；外國勢力介入他國內部衝突；民族優越感（ethnocentrism）輔以大眾媒體煽動產生的沙文主義（chauvinistic）與仇外主義（xenophobic）態度，在任一方誤解對方的行動目標、意圖與政策時，極可能將對方的防禦行為視為挑釁性威脅；缺乏有效的國際和平維持手段，導致國際間出現無政府的混亂狀態；國際危機。

參考資料

- 1 A. J. P. Talyor,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New York: H. Wolff Company, 1968).
- 2 J. David Singer, "International Conflict: Three Levels of Analysis," *World Politics*, Vol.12, No.3 (April 1960), pp.453-461.
- 3 James E. Dougherty, and Robert L. Pfaltzgraff, Jr., *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omprehensive Survey*, 3rd ed.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Inc., 1990).
- 4 Keith Eubank ed., *World War II: Roots and Causes* (Lexington, Massachusetts: D. C. Heath and Company, 1975).
- 5 Kenneth N. Waltz, *Man, the State, and War: A Theoretical Analy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 6 Joseph R. Cerami, and James F. Holcomb, Jr., eds., *U. S. Army War College Guide to Strategy* (Carlisle, Pennsylvania: U.S. Army War College, 2001).
- 7 希特勒著，唐玉美編，《我的奮鬥》（台南：文國書局，民國75年10月）。
- 8 郭紹榮，《西方的巨變1800-1980》（台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民國83年3月）。
- 9 鈕先鍾，《西洋全史（十五）第一次世界大戰史》（台北：燕京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66年3月）。
- 10 鈕先鍾，《西洋全史（十八）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台北：燕京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66年3月）。